

开放时代纪实文学系列丛书

广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

当爱情遇上爱情

张梅 学正 著

“现在流行做烤瓷牙，每个人都会问：是永久性的吗？有的医生就回答：你50岁做，就是永久性的，你30岁做就不是。爱情也一样，寿命短的人容易从一而终，可是活到80岁，想爱一生一世就很难。我不认为感情这东西会有什么损失，因为它不是一种计算，你很难说爱了一个人爱错了就是一种损失，爱对了就是一种获得，这是一个生命过程，就像一棵树长枝长叶，到了一定时候它自然会更新或者死亡。人活着，你就无法盖棺定论。”——辛兰如是说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当爱情遇上爱情

张梅 学正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爱情遇上爱情 / 张梅, 学正著; 广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编.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8.7

(开放时代纪实文学系列丛书)

ISBN 978-7-5360-5249-9

I. 当... II. ①张... ②学... ③广...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01162号

责任编辑 詹秀敏 李 谓

装帧设计 黄德辉 陈汝容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制 作 ◆广州公元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广州伟龙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规 格 760×1020毫米 16开

印 张 11

字 数 140,000字

版 次 2008年7月第1版 200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000册

定 价 23.00元

若有印装问题, 请致电020-38865309联系调换

目录

自序 片断 9

只有耐心等待的人才会出现奇迹。那些耐心等待的人，擦干净双手，洗干净身体，坐在爱情的圣殿门口天天祈祷。终于有一日，他们听到了爱情的钟声敲响在他们的心里。这时，美丽的玫瑰也开在他们的胸口上。

到底谁爱谁 41

我说：“爱琴的婚姻问题出在她的先生那里，但据我们观察，她的先生并不是一个好色的人。”

安妮说：“但他是一个对女性的美敏感的人，容易赞美和欣赏女性。你说，他是不是也欣赏你？”

我笑着说：“是不是他对自己的精力感到担心，所以要换性伴侣试一试。我在电影里看过这样的对白。”

安妮忧虑地说：“男人，其实都是不成熟的动物；你有没有听过他们说这种话？说男人是茶壶，天生就应该配几个茶杯。”

我说：“那我们应该用陆小曼的话回击他们。陆小曼说：我们女人是私人卫生间的牙刷，只能用于一个人。”

三位女性关于爱情的对白 57

“我不认为感情这东西会有什么损失，因为它不是一种计算，你很难说爱了一个人爱错了就是一种损失，爱对了就是一种获得，这是一个生命过程，就像一棵树长枝长叶，

到了一定时候它自然会更新或者死亡。很有个性和很没个性的人，在感情上照样有波折。你爱上一个人，跟他有一段过程，能结婚或者不能结婚，都不是一个休止符号，人活着，你就无法盖棺定论。”

有病还是没病

71

“一个四处流浪的男人碰巧在一个女人的房子里住下来，他喜欢并需要这个女人。他很有女人需要爱这方面的经验，通常他克制自己。可这次他使用的语言和表露的感情都是模糊不清的，因为他只是一时地需要她的友谊；他跟她做爱，但对他来说，这次跟他以前经历过的上百次的做爱没什么两样。他意识到他暂时需要逃避已使他陷入他最害怕的境地——一个女人说：我爱你。他插进话来，非正式地，像老朋友离别似的说，再见。人走掉了。在他日记里这样写道：离开北京，她恨我。好吧，恨就恨吧。几个月后，又写了一篇日记，是关于另一个女人的。”

天生报复狂

83

尼采说：“结了婚的哲学家有什么幸福？”

列一张感情表格

101

专家们常常劝人们列一张表来决定自己的选择。在“得”栏中写下你维持这段关系的所得；在“失”栏中写下你必须付出的代价。然后两栏相比，问问自己：“值得吗？”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安心待下来。别再抱怨；如果是否定的，鼓起勇气，开始计划未来。

完善自身和增进魅力 117

“人的吸引有三个来源：
心灵、智慧和肉体。
心灵吸引产生友谊。
智慧吸引产生尊重。
肉体吸引产生情欲。
这三种吸引的结合产生爱情。”

——《桃树枝》

孤独是我们的宿命 129

她很高，很瘦，穿鲜红的上衣。我注意到她脖子上挂着闪亮的项链，手袋上印着名贵的牌子。可是她的脸色却十分暗哑，名牌手袋也脏脏旧旧的。她的眼神呆滞，并没有因为钻石的光亮而生动流彩。

我看着她，那么瘦而枯黄的生命，好像在岁月的寒风中摇摇晃晃消耗殆尽的烛光。安稳的经济条件，轻松的工作环境，好像并没有给她的生命带来快乐。那么，她的快乐在哪里？

平衡的魔法 143

一般过路的人，可能会认为我的玫瑰和你们的很像，

但她一朵就胜过你们全部，因为她是我灌溉的那朵玫瑰花……因为她是我愿意听其发牢骚、吹嘘，甚至沉默的那朵玫瑰，因为，她是“我的”玫瑰。

——圣艾修伯里《小王子》

和张欣、李丹丹的对话

165

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崇拜天才的，当时觉得凡·高、高更简直就是超人，关于他们那些割耳朵呀，和妓女的风流事呀，感觉就是神话。当然，那些是真的英雄，还有些人造的英雄，如牛氓。我觉得人要从英雄境界回到平民境界是不容易的，需要很长的磨炼。

现代摄影（封面及内页插图）沈格非（广州）

埋伏	1
老宅	7
超级男生	8
大地主人	40
工棚闹喜	56
平静效果	70
独家商贩	82
许愿	100
农民模范	116
上岸	128
打倒反派	142
下海	164

以上图片均由本书作者张梅提供。





片断

自序

—

改革开放30年，身为一个中国人，一个广东人，一个广州人，用当前的话来说，就是“身处改革开放前沿地”的人，对这30年，我们有什么总结？

看看历史纪实，30年前，这个国家，广东省，广州市，我们自己，在干什么呢？中国传统的反思风格是以小显大，先从自己做起，这个传统，是古人传下来的。大口号不要讲这么多，一件一件事情做起。想想这30多年的历史，我们都是共产党的好孩子，因此所有人的经历都是相似的，因此也很好总结。

一个场景：1966年夏天的傍晚，周末。广州市流花路中苏友好友谊大厦，一座宏伟的灰色的苏式建筑，后为广州市交易会大楼。

一組组干部模样的男人女人成群结队且面带笑容地走进大楼，其中一对夫妇，丈夫个子很高，中山装，偏瘦，风度儒雅，妻子稍稍烫了头发，典型的上海女人的脸，他们带着一个五六岁的女孩子，女孩子个子高挑，一看就是身材像父亲，但脸却像母亲，上海人的脸。走进大厦的大厅，大厅里满是跳交际舞的人，夫妻很快就旋转在跳舞的人群里。

女孩子站在跳舞的大人们的外面，低着头。她困惑地看着一双双男人的皮鞋和女人的高跟鞋，她抬起头，想在熙熙攘攘的跳舞人群中找到自己的双亲，但很困难。在她的眼睛里，好像每一对跳舞的人都是那么的相像，男的中山装，女的烫了头发。她模糊地记得父母好像为母亲现在头上的发型争吵过，但不是激烈的。

女孩子记起了这座大厦里的另外的世界，有两个厅是她最喜爱的。其中一个在二楼，是专门放木偶戏的，上一个周末，她就在那里看了《小铃铛》，另一个厅是在大厦旁边的林荫小路上，在通往中苏友好友谊大厦的露天电影放映场的路上，那是一个哈哈镜室，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哈哈镜。小女孩站在里面，仿佛置身在一个神奇的童话世界里，她自己的身子一会儿变长一会儿变短，一会儿变胖，一会儿变瘦。她太喜欢那个地方了，她可以在里面待上一个小时。

想着那两个美妙的地方，女孩子悄悄退出了乐队正在奏着《红河谷》的舞厅。她不知道，重新听到乐队演奏这首乐曲，要在15年以后。

2000多公里以外的首都北京，毛泽东正在用一支铅笔在一张旧的《北京日报》的空白处写下了他的震惊世界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也是这一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广州很快也卷进了席卷全国的“文革”中。女孩子参加的那场舞会，是中苏友好友谊大厦的最后一场舞会，也是她父母的最后一场舞会。

中苏友好友谊大厦后改为交易会大厦，继续发挥着她对广州的重要经济作用。只是再没有舞厅，没有哈哈镜，没有露天电影院，没有木偶戏。

也是从这一天起，小女孩进入了一个红色世界，她的母校是广州市东风二路小学，现在叫东风西路小学，文革前叫德宣西路小学。她的先后两个班主任一个姓阮，一个姓温，后者是改革开放涌现出来的广州本地的第一代饮食界富豪“胜记”的老板温某的姐姐温莲芳，现常居加拿大。于是女孩先是当红小兵，后当红卫兵。学习毛主席语录成了她小学阶段最重要的教育。1968年的元旦，她和小同学们整齐地排列在学校的广场上，冒着凛冽的寒风，聆听重要的元旦社论，喇叭里传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激越的女声：“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上到底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一处处火山爆发，一顶顶皇冠落地，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一处安全的绿洲了。”

女孩在红色世界中慢慢成长，逐渐形成自己的世界观。

1974年，我从广州市第二中学高中毕业。无论是文革前的二中，还是现在的二中，都是名校。升大学率几乎是百分之百的，但我们毕业的那个年代，党号召我们上山下乡，于是我们就上山下乡。我高中毕业未满十六岁。当时我父亲在广州市机电局，我是张家的第五个孩子，因为前面四个哥哥姐姐均没有下乡。我大哥在广雅中学毕业时遇上了招飞行员。那时能当飞行员是何等的荣耀，不仅要学习好、身体好，而且要根正苗红，真的是在当时广州的中学生里万里挑一；我大姐在二中读到高中一年级的的时候就破了广州市少年组100米跨栏纪录，被“八一”体工大队看中，当时八一队的教练是天天到我家做我母亲的思想工作，要她同意我大姐到八一队，开始我母亲是不同意的，因为我大姐的学习成绩很好，母亲想她读完高中上大学。但经不起八一队的磨，于是大姐

在1965年就到了北京。我二哥也到了北京当兵，二姐读了卫校，所以我这个小女儿肯定就要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了。

一个场景：1975年，广州旧火车站，以前叫港九车站，也叫白云路火车站，简陋的站台，不知演绎过多少人生的悲欢离合。正是这年的五四青年节，站台上高音喇叭播放着响亮的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使得站台上的气氛很热烈高昂。站台上站着一堆一堆的青少年，全都是十六七岁的年纪，男生女生都是清一色的白衬衣深色的裤子，互相开着玩笑，大声说着话，这情景很像某部苏联电影里青年们准备去参军或到农村当乡村教师的味道。当时有一部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影响了很多青年，里面美丽浪漫的女主角不知激起了多少人对日后生活的幻想，一部小说《在那遥远的地方》也成了这批脑子一片空白的少年的人生指南。

女孩子明显长大了，很高，黑色的长发扎成一束马尾，皮肤雪白，媚眼如丝。十足一个美少女。她正和一群送她的同学和她哥哥的朋友在道别。

旁边，一个女生正和她母亲抱头痛哭。女孩子鄙视地看着她们。

终于，火车鸣响了。女孩子这才想起没有和父亲道别，女孩子有些茫然地抬起头来找父亲。只看见父亲离她们这帮年轻的同学稍远一点。女孩子走到父亲面前，叫了一声“爸爸”。她看见父亲眼眶红了一下，但什么话也没能说，挥挥手让她上火车。她不知跟父亲说什么好。她与父亲一向缺乏交流。

说老实话，因为那时年纪太小，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再加上自己一向乐观的性格，我倒对上山下乡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就这样，我到了清远县的江口公社石梨大队，刚去的头三个月，要和贫下中农“三同”，也就是“同吃，同住，同劳动”。我被分配到大队会计家中，一个高高瘦瘦沉默寡言的中年男人，他有五个孩子，连妻子是七人，连我是八人。当时农村没有电，点煤油灯。晚上吃饭的时候，一盏煤油灯照着桌子上的两碟菜，一碟是蒸芋头叶，芋头叶是腌制的，一星油也没有，一碟是炒油菜，因为没有油，炒出来的通心菜是黑色的。八个人对着这两碟菜，我连筷子都没有伸一下，赶快吃完饭就算了。这样的回忆并不是诉苦。说老实话，对于人生所受过的苦来说，那些事情

根本不算是苦，主要是当时一个16岁的小资女高中生，一下子没有转变过来。

一个场景：黄昏时分。春天的广东农村，江边暮色苍茫。一个年轻女孩子在山路上疾走。看上去她就是城里来的知青。她刚刚接到一份广州市粮食机械中等专业学校的入学报到通知。但她接到的时候已经过了学校的报到日期了。因此，疾走如飞的她心急如焚。她要赶到镇上打电话到学校。不知学校是否还保留她的位置。

当她急匆匆地赶到镇上并打通电话的时候，非常巧，在这个已经下班了的时候居然有人接电话，而且接电话的居然就是校长。校长非常和蔼地告诉她，让她不要着急，把回城的手续办好再来报到，学校一定等着她。放下电话的时候，女孩子流下了眼泪。

30年前，也就是1978年，我那时是一个充满了激情的无知青年。从经历上说，我那时刚从农村回来，结束了知青的生活。三年过去了，党又号召我们重新考大学，我们就参加高考。记得我们是在江口公社中学的礼堂里参加1977年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高考的，那时也没有先知跟我们说这次高考对于今后人生的重要性，我那时天天在县篮球队打球，打得很高兴，也没有怎么复习，就凭着文革中学到的可怜的一点知识参加高考，肯定是名落孙山的。不像当时有条件的同学，父母们早早就把他们召回广州温习，应付高考。结果我考上了韶关师范学院，当时是不会去的。1977年高考的制度比较灵活，你不上大学的话，可以上任何一间广州市的中专，但没有挑选权。我那时其实对上大学已经没有了兴趣，只是想回广州，于是选择了后者，被广州市粮食机械中等专业学校机械专业选中，于是就这样把户口迁回了广州。

重新讲这段历史，重要的是给这部书稿开个头，安排一个序幕。就好像是一场隆隆重重的戏，要演好多场，于是，先有一个引子，主角出来说一段话，这是我们中国戏剧的传统。这也使得观众进入主题之前有一个思想准备。

就这样，30年前的今天，我，作为中国人广东人广州人中的一员，就从生活了三年的农村回到了广州，重新继续自己的个人生活，城市生活。然后先当学生，再到工厂当技术工人，再到出版社当编辑，再当专业作家，再当文学杂

志主编，再重新当专业作家。我这30年的生活经历，应该说也不是单调的，我和广大人民群众一样，个人命运是紧紧和这个国家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的。可以这样说，把我的个人经历演练出来，国家的命运的脉络也可以在其中把得出来。

经历说完了，那么思想呢？我们的思想在哪里？从何来？到哪里去？

改革开放前，我们的思想应该说是一张白纸，在当时单一的苏式教育下，我们所具有的思想完全是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思想。我们认识的社会身份的人只有这几种：国家干部、工人、农民、教师，那时甚至连“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也非常淡化，几乎是没有的。对于阶级身份区别，我们更是乌托邦式的，在我们的教育里，只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概念，至于我们，肯定是无产阶级的，因为我们的一切，都是属于国家和共产党的，而我们是没有任何财产的，房子是国家配给的，家里的一些最简单的家具，也是国家配给的。于是，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在这种教育这种环境里成长起来，完全没有财产的概念。这是很重要的，人没有财产的概念，他就没有物质的概念。这对于他产生的思想是一个相当的基础。

于是我们就从一个没有财产没有物质的环境中成长起来，一切都是真空的，像生活在一个虚拟世界里一样。现在看好莱坞的电影《黑客帝国》，觉得那个虚拟世界太苍白了，太无趣了，我们是从那个虚拟世界走过来的。至于什么是“资产阶级”，对于我们生长在新社会的人来说，那都是一种概念，都是从小说或者电影中看到的；关于“地主、资本家”等的形象，都是从已经统一了口径的所谓文艺作品中产生出来。好像是坏女人肯定抽烟，思想变坏的小资肯定梳着分头。严格地说，我们都是没有思想的人，因为我们不需要思想。对于爱情的认识，我们更是蒙眛，在我们所认识的爱情中，最浪漫的就是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的保尔·柯察金和冬妮娅的爱情。我们所认识的爱情，都是和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作为女性来说，我们应该是幸运的。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强调的是男女平等，要把女性最大的能量发挥出来。因此，那时有《女飞行员》、《红色娘子军》、《五朵金花》这样的女性励志电影。在我们从小的教育中，我们从来都是鄙视那些不劳而获者，鄙视不劳动的人，鄙视当花瓶的人。从小到大，

我和我的两个姐姐在学校里都是大队长、中队长和小队长之类的，我在学校一直参加游泳队、篮球队和合唱队，我大姐拿过全国第一名、亚运会第四名，23岁就当八一体工大队的副大队长，我们从来没有感觉到男性比我们优越，更没有什么重男轻女的表现。所以，到现在，我们看到那些靠讨好男性来出人头地的女性仍然是鄙视的，这包括思想讨好和行为讨好。这也是造成我们一生独立自主不息的最大的原因。2003年，中国作协和英国大使馆在中国联合举办了一次文化活动，是中英作家一起在中国境内进行列车旅行，我有幸参加了这次的旅行，当旅行到了广州时，广州的英国领事馆为我们八个作家作了一次讨论会，主题大概就是关于女性的地位之类的。我当时就发言：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并没有感觉到女性的依附地位，因为我们都是红色的一代，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自力更生，自食其力，而且我们做到了。因此，在我们后来接触西方思想和现代主义文化，我们并没有障碍。直到现在，我们都是崇敬有思想的人，有创造能力的人，而鄙视那些依附权力鱼肉民众的人，哪怕我们清贫一生，至死不悔。

当然，在物质泛滥的现代社会，我们也曾经迷茫过，痛苦过，怀疑过，动摇过。因为现代社会的许多表面现象都是对我们从小的认识和信仰的极大的解构。所以为什么有现代主义？所以为什么张晓刚的油画《三个同志》能够在2007年的苏富比拍出2500多万？我们不能忘掉过去，在前进了30年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停下来总结一下？

我总是在想，16岁的时候，我在想些什么？我看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一边看一边在想，他们和我有关吗？少年都是反叛的吗？我的少年时期好像一点也不反叛。因为我们从一年级的的时候就闹文革，十年的时间都在反叛中度过，我们已经在心底里厌倦了反叛。我们渴望的是安定，什么时候能够一家人不再东南西北，能够安安心乐地坐下来吃一顿饭。记得16岁那年的国庆节，大姐和国家队刚从德黑兰参加完第七届亚运会回到北京，我高中毕业，去北京看姐姐，那是中国体育代表队自文化大革命以后第一次参加世界性的体育比赛，那时整个国家队的精神状态，是那样的饱满，那样的奋发。国庆节的晚上，我们一起在国家队的大楼天台上看焰火，火树银花，我16岁，大姐24岁。多好的年华。

当第一眼看到张晓刚的《三个同志》，我就感到了亲切和认同。他的这张油画就像我家里的某一本旧相本，里面某一张发黄的黑白照片，高中毕业时和两个密友一起到上下九那间“琳琉”拍的，“文革”中一家七口，等等，那么熟悉，那么亲切。又那么普通。真是太具普遍性和代表性了。这就是艺术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记得我在广州市业余大学读中文时，讲文艺理论的教师老是在讲艺术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我想，张晓刚的这张画就是典型了。

但人总是渴望受教育。这种天性决定了我们是高等动物。即使是最反对教育的时代，我们都在偷偷地看各种小说。记得初中的时候到广州造纸厂学工，那时的中学时兴学工、学农，一天晚上，连队紧急集合，原来是要批判一个男同学，他从准备进炉子的旧书堆里偷了几本小说出来。还记得那个同学胸前挂着偷来的小说，低着头。这个同学小学的时候跟我同班，调皮得不得了，那次事件对他打击很大，长大后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于是，我们就这样慢慢地长大了。直到上世纪的80年代。

上海人艺和香港春天娱乐公司合作的百老汇名剧《蝴蝶是自由的》来广州上演的时候，可谓轰动一时，各色人等倾巢而出，连从不买票请我们看戏的单位也破了例，虽然记得当时是坐在友谊剧院的最后一行，但好像也有一种搭上了火车的满足感。

虽然看完后有一种像是上了一堂关于自由的解说课的感觉，但还是有点沾沾自喜，毕竟是名剧呀。广州这个地方，上演名剧的机会一向不多，一有机会，就像过节一样。

但剧本给人以自由的震动还是不够强烈。为什么呢？据说她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上演率非常高，可谓场场爆满。可作为我们喜欢听台词的人，却觉得好像太过温火，没有听莎剧台词的那种满足感。至于剧本里写到的自由，却还是百分百的自由概念，因为它是弘扬个人的。看出这戏，最亲切的是令人想起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那时充满了自由的气氛，或者应该这样说，充满了追求自由的气氛。人们的眼光都是投注到自己的身上的。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应

该信奉什么样的哲学？我的思想是什么样的思想？那时候，各种各样的哲学、文学、音乐、美术的小团体自发地组合，整个社会充满了欣欣向荣的氛围。那时候我和朋友们还成立了一个“了了”文学社，自己出钱把文学社同仁们的诗歌、小说印成杂志，而我们这种小团体不过是当时社会上滚滚洪流中的一股小小的涌流。当时的广州在中国应该是最早追求个人意识的，许多小团体比后来名声大振的“星星画派”早得多，北京的许多团体也要比广州来得晚，觉醒得晚，而且现在看来，还是意义不同。广东的觉醒是追求个人的，就像《蝴蝶是自由的》，而北方的觉醒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都带有浓厚的政治意识。这也是广东的一个致命的归宿，觉醒得比别人早，但名却是别人出的。就像改革开放，广东也是先行一步，但现在摘桃子的还是上海。

我一直认为，上世纪有两个令人激动的年代，一个是30年代，一个是80年代。这两个年代都是思想解放、人才辈出的年代。30年代有明末清初的积累，80年代有建国30年各种运动的积累，一旦解禁，如雨后春笋，势不可挡。30年代我们是没经历过，但80年代我们是经历过的，一下子从封闭的氛围走出来，真是像春天的蝴蝶一样的自由，一样地渴望，而且脑子里没有一丁点儿的物质概念，整个社会也没有任何物质概念。人们脑子里充斥的都是各种各样的思想和潮流。当时艺术的繁荣是以没有物质污染为基础的。所以，我们现在怀念归怀念，而社会已经向前走了，自由已经以它另一个面目出现。但既然《蝴蝶是自由的》受到全世界人民的热烈欢迎，那我们对自由这一主题就不用担心它变质了。

1982年，我在广州机床厂技术科工作，也住在工厂的集体宿舍里。那时去广州图书馆办了一张借书卡，借的第一本小说，就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还记得这本小说当时给我是如此大的震动，我在书上记满了笔记，在技术科的办公室里通宵达旦地读，内心充满了感激。感激作家给了我一个文学的新世界。一个如此有想像力的美妙的世界。

20世纪80年代真是一个美妙的年代。我们天天晚上跳舞、聚会，各种文学沙龙，每天都可以见到有趣的人。到处都是讲萨特、卡夫卡、弗洛伊德，每个